

MIN GUO SHI QI TONG ZHI JI JING SI XIANG YU SHI JIAN
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 (1927-1945)

● 陶宏伟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M I N G U O S H I Q I T O N G Z H I J I N G J I S I X I A N G Y U S H I J I A N

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 (1927-1945)

● 陶宏伟 著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主编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2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

I. 晋… II. 山… III. 商业史—山西省—文集
IV. F7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7601 号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11 层

电话: (010) 51915602 邮编: 100038

印刷: 北京银祥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

组稿编辑: 杜 菲

责任编辑: 杜 菲

技术编辑: 晓 成

责任校对: 郭红生

720mm × 1000mm/16

13.75 印张

217 千字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 12 册 总定价 432.00 元

书号: ISBN 978 - 7 - 5096 - 0210 - 2/F · 206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
负责调换。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山西财经大学

《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编委会

学术顾问：孔祥毅 张正明
编委会主任：杨怀恩 原梅生
编委：樊而峻 郭泽光 赵国浩 崔满红 王 森
黄鉴晖 葛贤慧 武三林 阎应福 孙长青
张亚兰 王永亮 乔 南 陶宏伟
主 编：崔满红
编辑部主任：王永亮
编 辑：陈 啸 薛秀艳 杨志勇 侯海燕

总序

山西是中国商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山西商人是中国经济史上的劲旅，明清晋商更是因创造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历史奇迹而成为当时中国十大商帮之巨擘。历代晋商及其成就的辉煌事业虽然早已渐次消逝，但他们从崛起到兴盛、由兴盛而衰落的史实却蕴藏着丰富而绚烂多彩的知识瑰宝，在经济、管理、社会、艺术、法律等多学科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山西财经大学是国内建校时间最早的财经类高等院校之一，是从乔家大院走出来的商科大学。经济学、管理学始终是学校的优势学科，晋商研究始终是学校科研工作的特色之一。学校有组织的晋商研究工作已有近50年的历史。

1960年，原山西财经学院成立了山西票号史料整理小组，开始了晋商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经过30年的研究，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以《“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杨荣晖，《光明日报》1961年5月22日第4版）、《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一集》（山西财经学院1982年编印）、《山西票号研究集·第二集》（山西财经学院1984年编印）和《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初版）为主要代表，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1991年开始，原山西财经学院的晋商研究工作突破了经院范式，呈现出历史考证与现实借鉴相结合、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并举的特色。1997年10月，原山西财经学院和原山西经济管理学院合并，更名为山西财经大学，学科特色和学术传统得以继续和加强。2002年，学校建成了金融货币史博物馆。2004年，山西省教育厅依托我校建立了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这个阶段，我校的晋商研究视角不

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1927-1945）

断拓展，研究成果更加丰硕——《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孔祥毅、张正明，《山西日报》1991年11月18日、19日连载）、《山西票号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年初版，2002年修订）、《明清山西商人研究》（葛贤慧，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中国银行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商路漫漫五百年》（葛贤慧，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金融贸易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晋商经营之道》（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年）、《明清山西商人研究》（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晋商在会计发展史上的贡献》（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增订）、《山西票号研究》（孔祥毅、王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孔祥毅，《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金融票号史论》（孔祥毅，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镖局、标期、标利与中国北方社会信用》（孔祥毅，《金融研究》2004年第1期）、《中国钱庄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典当业史》（黄鉴晖，山西经济出版社，2006年）是其中的代表。

近年来，学校为了提高教育质量、突出办学特色，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商科大学教育教学模式的要求，明确将传承晋商文化、弘扬晋商精神、构建学科体系、培养商科英才作为办学指导思想，并加大了各项投入；在科学研究、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博物馆建设等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2007年，学校将山西票号与晋商研究中心更名为晋商研究院。为了秉承学术传统，强化办学特色，开创晋商研究工作新局面，学校设立了晋商研究专项基金，责成晋商研究院编辑、出版了这套“晋商研究当代文库。”

本文库不限定册数，不定期出版。今后将陆续推出新的相关研究成果。

热忱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孔祥毅

2008年1月10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统制经济思想的产生及内容	22
第一节 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统制经济思想	23
第二节 民间统制经济思想	33
第二章 抗战时期统制经济思想的发展	44
第一节 抗日战争前后“战时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	44
第二节 统制经济思想的发展	52
第三章 抗日战争前统制经济实践	62
第一节 抗日战争前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制经济实践	62
第二节 以山西、广东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的统制经济实践	72
第四章 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	82
第一节 统制经济加强的社会基础	82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体制的建立	90
第五章 工业统制	99
第一节 国家工业化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99
第二节 工业统制	105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时期国营工业的地位与作用	111
第六章 农业统制	117
第一节 战前国民党政府的农业政策	117
第二节 战时农业统制	121
第七章 金融统制	134
第一节 国民党政府金融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134
第二节 中央银行体制的进步与缺陷	146
第三节 私营商业银行的衰落	152

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1927 - 1945)

第八章 贸易统制	157
第一节 对外贸易统制	157
第二节 物价统制	165
第九章 日本在华的统制经济	175
第一节 日本对华统制经济思想的产生	175
第二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统制经济	178
第三节 日本在台湾地区的统制经济	182
第四节 日本占领的关内地区的统制经济	184
结 语	195
参考文献	204

绪 论

恩格斯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①

从1927年建立，直至1949年撤到台湾，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这22年中，国民党政府的实际统治范围没有真正扩展到近代中国的整个版图。由于国内战争不断，加之1931年东北沦陷，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政府没有集中全部力量致力于国家经济建设。但是不可否认，尽管有许多曲折，国民党政府时期国民经济还是延续了自清末以来的缓慢发展，甚至在某一时段，某些行业还呈现出一定的繁荣。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国民党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史研究相比，民国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的研究还非常薄弱。本书试图对贯穿国民党政府主要时期，曾在经济思想领域讨论颇多的，并在一些具体经济领域不同程度付诸实施的“统制经济”，做些探讨与研究。

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社会经济状况

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时，面临的是近代中国经济贫穷落后的局面。一方面是西方列强通过对华的大量投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财政命脉；另一方面是国营经济的衰退，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难以独立发展。经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

了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后，社会各界企盼有力政府，实现政治统一、国家统一。希望政府扶持、干预振兴经济的思想逐渐成为主流。

(一) 经济总量上农业为主，工业中手工业占据优势

中国传统社会历时两千多年，在这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核心。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水平在明清时期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高峰。鸦片战争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不断加深和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中国近代农业出现了带有资本主义成分和性质的富农、经营地主以及垦殖公司等新型农业生产组织形式，但是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仍处于统治地位，沉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以及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近代的农业资本主义一直没有发展起来。1920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为219.03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为165.2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5.42%，工业总产值为53.83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58%。^①直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十分落后。根据比较可信的1933年的统计，农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5.5%，而近代工业只占9.5%，手工业占24.6%。在整个民国时期，农业这一传统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产业。^②

中国手工业生产同样历史悠久，门类众多，一直是社会商品生产的主要形式，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中占有显著地位。鸦片战争后，作为中国传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手工业同样发生巨大变化。在外国工业品的冲击、社会生活时尚变化等因素的影响下，中国手工业中的不同行业呈现出了不同的命运，有的行业在机制工业品冲击下日趋衰落，如土针、土钢、土烟业、踹布业等，有的行业积极向机器工业转化，并取得新的发展，如缫丝业、丝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由于近代机器大工业在中国发展的缓慢，这使得手工业生产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没有减弱，除了城镇中生产小商品的独立手工业，相当于家内副业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外，工厂手工业、包买制手工业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近代中国工业结构呈现出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工业同时共存、相伴

①②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并行的特征。“此时的手工业生产，在中国工业生产中的地位，不仅当然是举足轻重的，而且是首屈一指。”^①

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工业制造产值中手工业仍远远超过机器制造业。据章长基、吴承明估计1920年的近代机器制造业产值只及当年手工业产值的19.11%，巫宝三估计1920年工业总值为550345.6万元，其中手工业产值462058.6万元，占83.6%，而机器工业产值为88287万元，占16.4%。甚至到了1933年，手工业产值在当年工业总产值中仍占66.57%。^②此外手工业产品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占据着绝对优势。1920年手工业产品出口21340.26万关两，占总出口值的39.4%，1925年为23117万关两，占29.78%。如以制成品、半制成品计算，手工业对机器工业的优势就更为明显。^③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工业结构中的优势地位，是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相适应的，手工业中地区间的、行业间的不平衡也符合工业发展由先进到落后地区，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顺序。但是手工业的优势地位也证明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和缓慢，而机器大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落后，成为近代中国抵御列强侵略的软肋。在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日趋严重的形势下，国家优先建设发展重工业或国防工业的重要性、紧迫性为各界所接受。

（二）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的控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在以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继续剥削、掠夺落后国家，强化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同时，以资本输出为主要形式的金融资本的对外扩张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控制亚非拉等落后国家的主要力量。到1927年国民党政府建立时期，西方列强不仅在华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了对煤、铁等重工业的垄断，而且通过扩张外资银行，提供各种借款等金融活动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命脉。

^{①③} 王翔：《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

^② 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

1. 西方列强在华的工业投资

以 1895 年的《马关条约》为界，在甲午战争前的半个世纪，外国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的厂矿，规模较大的、资本在 10 万元以上的，一共不过 23 家，资本估计为 7600 万元。在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 20 年中，根据不完全统计，同样规模的厂矿，达到 136 家，资本在 1 亿元以上。^① 在 1914 年，外国在华的工矿交通等企业的投资，总计达 12.8 亿美元。而到 1927 年，外国在华工业已遍及木材、机械、金属品、电器用具、交通用品、建筑材料、水电气、化学品、纺织品、服装用品、胶革制品、饮食品、制纸印刷、饰物仪器、杂项 15 大行业。其中尤以纺织工业中的棉纺织、机械工业中的船舶修造、饮食品工业中的卷烟以及属于公用事业的水电气工业这四大支柱工业最为突出。^②

帝国主义在华建立的这些企业，凭借各自政府在华特权所提供的直接支持，以及自身的资本优势，取得了对中国民族企业的垄断地位。如 1882 年成立的上海电光公司，开创资本不过 5 万两，到 1928 年改组为上海电力公司时，资本已增加到 3500 万两，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发电企业。同样是公用事业的上海煤气公司，1928 年的资本已达到 250 万两，为开办时资本的 25 倍。在许多行业中，外国工厂垄断了整个行业。如 1902 年进入中国的英美烟草公司，长期垄断中国卷烟市场，1924 年其在中国卷烟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 82%。^③ 与同一时期实力强大、扩张迅速的外国企业相比，中国的民族工业只能说是有所发展。1912 ~ 1927 年的 16 年中，中国所创办的资本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 1984 家，资本总额约为 45895.5 万元，平均资本额为 23.1 万元。在这些新设的工矿企业中，‘小企业占多数，并且多集中在棉纺织、面粉加工等轻工业。即使是在这些行业中，外国企业也对中国企业形成巨大竞争。如 1925 年中国本国纱厂有 68 家，纱锭 1846052 枚，而同期日本在华有 45 家工厂，1268176 枚纱锭，并且日本纱厂资本雄厚、技术先进，市场竞争力强，与中国纱厂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 - 1914）》，科学出版社，1957 年。

②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 - 1927）》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 年。

形成激烈竞争。^①

在煤炭、钢铁、铁路等重工业领域，外资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满铁株式会社控制的抚顺煤矿在1927年产量突破700万吨，成为当时中国新式煤矿产量第一的煤矿。抚顺煤矿与英国夺取的开滦煤矿分享了中国主要的煤炭市场。以华中地区经济中心上海为例，1927年输入的煤炭总数为3108千吨，其中开滦煤占30.1%，抚顺煤占18%。^②此外外资公司还在中国疯狂地掠夺战略资源。日本以贷款或是参加投资的形式控制了中国的铁矿生产，1927年中国全年铁矿总产量为118.1万吨，而其中99%为日本所控制，并几乎全部输往日本。^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自行修筑铁路，控制中国的交通命脉。俄国铺设了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德国修建了胶济铁路，法国修建龙州、滇越铁路等。与铁路一样，列强还在中国设立航运公司，控制中国的江海以及内河内港航线。1912~1927年外国轮船的吨位数在中外轮船吨位总数的比例始终不少于71%，1924年，外国轮船进出口中国通商口岸吨位数突破亿吨大关。^④列强通过修建铁路、控制航运，不仅可以更加便利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倾销其产品，而且还有其军事和政治目的，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加重了中国的殖民地色彩。

2. 西方列强对中国财政、金融的控制

从鸦片战争开始，外国银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金融战舰，凭借不平等条约和租界的保障，在中国经营存贷款、把持汇兑、发行钞票、投资企业以及通过对中国政府的贷款等手段，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从金融上控制掠夺中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重要工具。较早的、比较有实力的外国银行有法国的东方汇理、英国的汇丰、德国的德华、日本的正金、俄国的华俄道胜等银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外国银行的数量增加更多，其中重要者如英国大英银行、沙逊银行、美国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友华银行、友邦银行、日本住友银行、三井银行、三菱银行等。到1926年，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总分行有70余家。尽管中国民族银行在20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②③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

民国时期统制经济思想与实践 (1927 - 1945)

世纪前 20 年中有了很大发展，与外国银行、钱庄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对外国在华银行长期称霸中国金融业的局面形成有力挑战。^① 但是因为这些外国银行在中国的优势地位，是以其本国在中国政治、经济地位形成的实力地盘为基础而建立的，英法银行势力在华中和华南，美国银行在华北和华中，日本在东北、华北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外国在华金融势力的地位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而在这些外国银行中，日本在华银行势力增长最快，在 1894 年前有 1 总行 1 分行，1895 ~ 1913 年有 4 总行 29 分行，1914 ~ 1930 年有 28 总行 75 分行，为日本的对华侵略提供金融支持。

外国银行除了在投资、汇兑等方面的金融活动外，还积极参与了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的各种借款。清政府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弥补财政危机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本息高达 9 亿多两白银的庚子赔款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北洋政府财政极为拮据，1923 年北京政府的岁入还不及总支出的 1/10，1924 年其实际收入，只有应收数额的 7/10，支出总数超过可以使用数额的 17 倍之巨。这使得北洋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内外债。这其中以 1913 年由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和横滨正金银行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的，以中国全部盐税以及部分关税为担保的“善后借款”，1917 年日本提供的“西原借款”最为著名。除了财政借款外，还有建设铁路、电信等实业借款。1895 ~ 1927 年中国的外债总量为 30 亿余元，债权主体有英、德、法、美、日、俄等 15 个国家以及一些国际银行团。至 1928 年 7 月，南京国民党政府面对的外债有待清偿的本金 3.22 亿美元，另有铁路外债待还本金 1.83 亿美元，交通部门欠还外债本金 0.3 亿美元，共计 5.25 亿美元。^② 为了维持债信并取得外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承担了这些遗留债务，继续用盐税、关税来偿付，这使得帝国主义继续控制中国的盐税和关税两大税收。

① 朱荫贵：《抗战爆发前的外国在华银行——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② [美] 杨格，陈泽宪、陈霞飞译：《1927 - 1937 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三) 经济建设主导力量的变化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除了外国在华的资本主义外，还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资本主义；二是私人资本主义。清政府为抵御西方列强，移植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先后创办了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在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纺织、轮运和主要的矿业采取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政策。但随着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企业的失败，私人产业资本得到发展。1895年以后，私人产业资本开始超过国家资本，私人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国家资本主义在主要产业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民国北京政府基于财政本位，沿袭了中国封建王朝对经济的控制垄断，试图重新以国家资本控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和财政权力，不仅控制、收夺私人资本的带有暴政性质的经济行为大多失败，而且没能维持、发展国家资本，造成国家资本主义中断。同时，私人资本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取得了较大发展，继续在产业资本和经济发展中保持了主导地位，但自由资本主义自身矛盾，以及政治等因素，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隐患。

1.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家资本主义的衰落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各地军阀割据，特别是在袁世凯死后，中央政府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各派军阀控制的政府更换频繁，国家财政时常连政府日常行政开支都无法维继，就更难以保证对从清政府继承下来的官办企业的维持，也少有资金兴办新的企业。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创办的一个大型企业，后来分为兵工厂和江南船坞。兵工厂因政府更替，经费无着，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1925年北京政府决定把工厂改为商办，后又同意将该厂变卖，以充军费。后因该厂估值太低，尚不足以抵偿上海总商会的垫款，而只能继续不死不活地维持。除了中央直辖的许多官办企业日益萎缩外，一些原先地方政府所创办的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也在分崩离析的政局下，或直接转为民营，或为所在地的军阀控制，最终也常因地方军阀的财政拮据而被转为民营。如1908年官商合办的广东自来水公司，1909年官商合办的广东电力公司，1914年收归官办的闸北水电公司，最终都改归商办。北京政府的直属工厂，1912年为58家，1915年曾经上升到80

家，1917年又下降到68家，这68家企业的煤炭消费额只有1912年58家企业的37.9%，企业规模大大减少了。^①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企业的衰落，被有的学者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瓦解和中断。

在官办企业衰落的同时，私人资本却取得了较大发展。民国北京政府成立之初，兴办实业的热潮席卷全国，以张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袁世凯等军阀在当时国家经济中私人资本主义占有重要地位的情况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制定了许多保护、支持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1912~1927年的16年中，中国历年所新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总数达1984家，这些企业又多为集中于纺织、面粉等轻工业的民营企业。

由于巨大的战争费用和外债，出于解决财政困难的需要，北京政府开始对民办实业收归国有。袁世凯不顾广大商民的反对，推行与清末“干路国有”性质一样的“统一路政”的暴政，以债券抵偿的形式，巧取豪夺，将各省民办铁路公司收归国有，然后以路权向西方列强取得借款。北京政府与各国及国际财团共签订铁路借款合同39件，总金额为3.88亿元。袁世凯从铁路提取“特别解款”4000万元，1921~1926年历届政府提款共为7045万元。^②这是北京政府对私人资本掠夺最明显的，也是为数不多取得成功的行为。此外，北京政府还出台政策，加紧对全国矿权的控制。1914年，农商部宣布“本部以铁矿关系重要，拟定仿照食盐、煤油之例，作为国家专营。嗣后矿工请领铁矿执照，一律不准发给。其从前曾经领照之矿，除……大总统批准特许外，或将其矿权设法收回，或将矿砂由官收买，以示限制”。在轻工业、金融业领域，北京政府官夺民业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北京政府借“合办”之名企图控制和收夺近代卷烟业中最大的民营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而交通银行被北洋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控制后，就成为军阀政府滥发公债、钞票以维持财政的工具。由于缺乏足够的政治权力和财力，北京政府对民营实业的收夺大多失败。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收归国有的行为，由于是出于财政本位，是为借取外债或是以解财政一时之需，而演变为军阀政府对私人资本主义的直接掠夺和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②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破坏，失去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意义。

2. 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隐患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私人资本主义或民族资本取得了较大发展。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已有许多专著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这里主要探讨这一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无能力对经济实行控制的情况下，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1) 私人资本主义出现盲目发展、无序竞争和投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的棉制品大为减少。这样中国最主要的民族工业行业——棉纺织工业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1912~1927年，中国本国的纱厂共设立86家，占1890~1927年中国新设纱厂110家的78.2%，这86家纱厂的创办资本总额约为13670.3万元，占110家纱厂创办资本总额15533.3万元的88%。特别是在1912~1922年的10年间，中国本国纱厂从22家增至65家，纱锭从510008枚增至1632074枚。民族纺织业的膨胀，加上同时期日本纱厂的扩张，超过了国内棉纱市场所能容纳的限度。当时有评论说“吾国纱厂事业，自欧战起后，获利甚厚，国人鉴于利之所在，均争相投资，设厂增锭。迨欧战告终，本纱之输出杜绝，外纱复纷至沓来，遂致连年市价，一蹶不振”。1923年，有25%~30%的华商纱厂倒闭。^①私人资本主义为追逐利润的盲目发展，无序竞争，成为欧战后中国棉纺织业陷入萧条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竞争的无序、货币制度的混乱、外汇价格的波动也助长了市场上的投机之风。1921年，因为上海物价波动剧烈，市场银根奇紧，使得私人资本投机于地产，正常的工商业就受到很大影响。这种私人资本盲目发展及投机盛行对于近代中国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极为不利。

(2) 政府职能缺失下，私人企业、资本的集中。

民国北京政府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政府，并没有改变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也没有在恢复中国主权方面有所作为。帝国主义仍然在中国享有各种特权，外国企业可以在中国不受限制的建厂，外国商品只交纳极低的关税就可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在纺织行业，日本在华纱厂从1913年的5家，111936枚纱锭，扩展到1922年的25家，671828枚纱

^① 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